

清雍正朝西湖行宫改置圣因寺园林考论

陈兆肆 黄思珩

(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雍正五年,清帝同意浙江总督李卫所请,将康熙帝的西湖行宫改造成圣因寺园林。自此,圣因寺园林开始呈现“景观化”和“宗教化”的双重特性。此举绝非“体圣心而惜物力”之类表面说辞所能解释,实则背后有强烈的政治意图,具体表现在:以“俯顺浙民慕思无已之诚”为由,缓和雍正帝先前与浙江士民剑拔弩张的关系;通过士民御容瞻仰、御碑观摩等活动,完成天命、亲民、仁泽等诸多意识形态的教化和渗透,成为“恩威并施”统治策略的具体展示;利用改造后的圣因寺,对以杭州为中心的浙江佛教秩序重加整顿,并适时获取地方情报。

关键词:雍正朝;西湖行宫;圣因寺园林;政治教化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25)05-0124-12

杭州西湖历唐宋两代,几经浚治,风光秀丽,屋宇环立,四民往来其间,共同构成了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完美结合的一方胜地。元明两代,惩南宋之覆辙,时人“以西湖为尤物破国”,是故对西湖长期“废而不治”。^①及至清代,因康、乾二帝的多次南巡及雍正一朝的大力治理,西湖在经历元明两代的低谷之后,再度“大著于天壤之间”。^②康熙帝数次南巡,在杭州孤山建设西湖行宫,属皇家禁苑,而雍正五年,清帝同意李卫所请,将此皇家禁苑改造成士民皆可踏足的圣因寺园林,此后该园林呈现出“景观化”和“宗教化”的双重特征。对此,汪利平曾将西湖风景之恢复置于清初政治的具体情景中加以审视,侧重于政治力量对西湖景观的再生和重塑。^③不过,西湖景观又是如何成为帝王调动的文化资源以达成政治目的,则缺少更进一步的个案探究。此外,学界对清代圣因寺已有一些零星研究,但对其沿革变化的梳理既失之于简,亦未对上述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④本文尝试通过爬梳和利用宫中档案、方志、文集等多元史料,全面呈现雍正朝西湖行宫改置圣因寺园林的详细过程,并重点探讨圣因寺园林设计背后的政治教化用意。

一、从“皇家禁苑”到“士民观瞻”:西湖行宫改置圣因寺园林考

揆诸史料,西湖行宫自康熙四十四年初建至雍正五年之间,一直保持着皇家禁苑的管理模式,民

①按,明正德年间,因杭州知府杨孟瑛的努力,西湖“久废而不治”的荒芜景象有所改变,但杨孟瑛后为“豪右所忌”,被御史纠劾而去官,治湖成果未能得到很好保存;此外,杨孟瑛的治理仅使西湖基本恢复了唐宋时期的面积,而相关景观尚未恢复。参见田汝成著、陈志明编校:《西湖游览志》,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4—5页。

②乾隆《西湖志纂》卷首《名胜图》,清乾隆二十年赐经堂刻本,第5页。

③汪利平:《杭州景观建设与清代政治文化》,夏明方主编:《历史的生态学解释:世界与中国》(《新史学》第6卷),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61—182页。

④叶盛:《杭州孤山康熙行宫与乾隆行宫之比较分析》,《文博》2017年第3期;徐瑾:《清代皇帝御容安奉制度探析》,《故宫学刊》2015年第2期;范丽娜、许敬婷:《乾隆皇帝与圣因寺本〈十六罗汉图〉》,《艺术探索》2020年第3期。

众不得接近和进入。至雍正五年,经李卫奏请、雍正帝谕准,西湖行宫改建为圣因寺园林,并且允许士民入内祭拜、游观,从而一改禁苑之本色。

康熙帝曾六次南巡,五次到达杭州,分别为康熙二十八年二月、三十八年三月、四十二年二月、四十四年四月及四十六年四月。南巡初期,康熙帝厉行节用爱民、勿扰民生的政令,往往驻蹕于尖营、御舟或名胜、官衙之内^①,抑或简要改造故宫、寺庙、名人祠堂而为临时起居之所。^② 这些建筑规模不大,亦未专作行宫之用。如康熙二十八年首度南巡至杭,选择杭州织造署为驻蹕之地。^③ 史景迁等认为,康熙帝南巡驻蹕,弃督抚衙署而就织造官署,实因“织造官”系皇家心腹,而江浙等地仍时有风波。^④ 此后,由于康熙帝屡次驻蹕该地,织造府便将部分衙署功能移出另置,而设为皇帝巡幸专用,后又扩充规模。久之,织造署全境悉皆驻蹕之用,“即奉为行宫”。^⑤ 因其位于杭州府城之内,故被称为“内行宫”。康熙帝南巡后期,出于游玩之便利及内行宫地理之局限,着手在孤山南侧另造一座专用行宫——西湖行宫,因其建于杭州府城之外,故被称为“外行宫”。西湖行宫于康熙三十八年左右建成,而于四十四年四月首度正式使用。^⑥ 此外,康熙四十五年,杭州织造孙文成于“内行宫”大门外购买民地,开浚城河,以联通涌金水门。^⑦ 自是,皇帝御舟可经水道,过涌金水门,达西湖,至孤山,从而沟通了城内城外两座行宫。^⑧ 因此,时人称西湖行宫:“辟孤山以建行宫,并疏涌金门城河以达……盖自有西湖以来未有若斯之盛者也。”^⑨

据雍正《西湖志》记载,康熙朝西湖行宫分为东路、中路和西路三个区域。中路正殿为“澄观斋”,第二进为“涵清居”;东路第一进为“西湖山房”,第二进为“揽胜斋”,正对西湖南岸之吴山;西路为御花园,园中有一亭,名为“光碧亭”,又有一楼名为“万岁楼”;行宫后部山中有一泉,名为“淳泉”。另外,结合今辽宁省博物馆藏王原祁《西湖十景图》可知,此时孤山顶上还有一座“六角亭”。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西湖行宫整体面积较小,布局也较为简单。^⑩

不过,既为行宫,则视同皇家禁苑,有严格的管理规定,无关人员不得靠近。皇帝驻蹕时,銮仪卫的銮仪使负责行宫防卫事宜,包括随扈保驾,行宫守卫、戒备等等。^⑪ 参加防卫工作者尚有前锋营、护军营、侍卫处、步军营、骁骑营等机构的官兵。杭州驻防八旗官兵“分班以卫行园”,杭州府则派遣绿营官兵 16 人参与守卫、戒备工作。^⑫ 行宫戒备森严,“各门皆挡门栅,游人不敢入”。^⑬ 皇帝返京后,西湖行宫则委托两浙盐业机构——宁绍分司统筹管理,其日常事务例由所设总管各官专司。^⑭ 总体而言,西湖行宫看守严密,戒备森严,一般民众难能靠近,更勿论进入。

康熙四十六年以后及雍正一朝,未再举行任何南巡活动,故原来之“内行宫”重新恢复为杭州织

①参见何峰:《康乾南巡与江浙地区行宫研究》,《社会科学》2018 年第 2 期。

②参见孔俊婷、王其亨:《法天则地揭意象——清代行宫园林选址考析》,《清史研究》2005 年第 4 期。

③⑤乾隆《西湖志纂》卷 4《南山胜迹上》,第 1 页。

④参见何峰:《康乾南巡与江浙地区行宫研究》,《社会科学》2018 年第 2 期;[美]史景迁著、陈引驰等译:《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8 页。

⑥《清圣祖实录》卷 220,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庚午,《清实录》第 6 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2 页。

⑦乾隆《杭州府志》卷 12《公署》,清乾隆四十九年刻本,第 7 页;乾隆《西湖志纂》卷 4《南山胜迹上》,第 1 页。

⑧朱琨:《西湖行宫研究》,天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年。

⑨雍正《西湖志》卷 2《水利二》,清雍正十三年刻本,第 3 页。

⑩参见雍正《西湖志》卷 10《寺观一》,第 1—3 页。

⑪赵云田:《清代的行宫》,《清史参考》2016 年第 29 期。

⑫光绪《钦定大清会典》卷 86《八旗都统》,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第 1—2 页。

⑬李斗:《扬州画舫录》卷 4《新城北录中》,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22 页。

⑭按,宁绍分司是隶属于内务府的两浙盐业管理机构之一。之所以委托其管理西湖行宫,一方面是因为其内务府的下属身份,皇家信任;另一方面,行宫修建维护等费不由国家正帑支付,例由这些盐业管理机构支付。参见金磊:《中国建筑文化遗产》,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85 页;《奏报拿获盗窃杭州行宫器物之贼犯徐大、方大来二人》,《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 8 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6 年,第 196 页。

造府署,而作为“外行宫”的西湖行宫也被闲置。即便如此,此时西湖行宫仍以禁苑对待,具体表现在:首先,时时修缮,保持坚固完好。康熙四十九年十月初五日,康熙帝令浙江巡抚王度昭查看西湖行宫有无修理之事。次年正月,王度昭在经过一番调查后回奏道:“至西湖行宫细细查看,由大门以至寝宫书房园亭,各坚固完好,间有瓦片渗漏处,藩司捐银修整,所费无多,并未累民。”^①“捐银修整,所费无多”这样的结果,当令康熙帝满意:若无一丝修葺,则有不尊圣上之嫌;若动用公帑大肆修缮,则有损圣名。由此可见,康熙四十六年后西湖行宫虽不再使用,但依然有官员定期查看、修葺,这也为西湖行宫后来的改置奠定基础。

其次,在法律地位上,西湖行宫与京城皇宫无异。雍正初年,西湖行宫虽平日设有兵役守护,但管理仍有所怠忽。如雍正三、四年间,行宫中御用器具屡遭盗窃,令时任浙江巡抚的李卫“不胜骇忿”,遂严令地方文武官员迅速破案。后来缉获贼犯,查系行宫工人,熟识路径,乘便行窃。浙江臬司拟照“盗官物律”定罪,但被李卫以“事关圣祖行宫重器”而断然否决,并要求从严惩处。在李卫看来,先朝行宫岂能等同普通官所,先帝所用器具又岂能等同一般官物,故最终作出严处:“将首犯即行正法,从犯割断两旁懒筋,借此一二人使匪类知所警戒,抑或俱行尽法,痛处后一并割筋,使其终身不能再为盗贼之处。”^②此处相关首犯未适用一般死刑案件的秋审制而即行正法,其从犯亦处以“割断两旁懒筋”,正是依照“行宫行窃”之例而作处理。^③

雍正五年五月,浙江总督李卫将行宫被窃及贼犯惩罚情形向朝廷奏报,后雍正帝在朱批中表示对西湖行宫善后之事,“曾再四筹度,尚未宣发谕旨”。^④雍正帝此时似心中早有主张,唯觉宣布时机尚未成熟,或是自己不便宣布,而要借宠臣李卫之口道出。该年八月,李卫便奏请将西湖行宫正式改建为佛寺,雍正帝很快允准,并钦定寺名为“圣因寺”,御书匾额。^⑤之所以定名为“圣因寺”,有多元之用意:一在宗教层面上,唐宋之际,杭州即有圣果寺,此“圣因寺”与之对应,以合佛教“因果”之律意。此种解释将“圣”理解成佛教“西方三圣”,而将“因”理解成佛教意义上之“前因”。二在家庭伦理层面上,取“无改父之道,真堪以孝称”之意。此“圣”系指“圣王”或“圣祖”,此“因”系指“因沿”。三在政治伦理层面上,乾隆帝曾以诗的形式对“圣因”二字作出别具新意的诂解,其谓“圣尧游豫总因民”。^⑥显然,乾隆帝将祖父康熙及自己南巡之事,视作效仿“圣尧”“因应”民意之举,这也是乾隆帝在论证南巡合法性时屡屡诉诸的说辞。此“圣”亦即“圣王”之意,而“因”则释为“起因”“因应”。

雍正五年后,圣因寺园林基于西湖行宫而踵事增华,尤其是在西北部不断拓展空间,增加园林景观,最终将其塑造成士民可入内礼佛和游观的宗教性园林。^⑦这一时期寺内的整体布局,在雍正《西湖志》、乾隆《西湖志纂》及雍正《浙江通志》等文献中皆有图文反映。值得一提的是,广义上的圣因寺园林,虽以佛教寺庙——圣因寺为名,但涵盖了周围孤山上的大部分景点,既包括雍正《西湖志》卷3《名胜一》所载以万岁楼为中心、先东而后西的各景点,同时又包括卷10《寺观一》所载以“圣因寺”大门为起点的“寺区”。由雍正《浙江通志·圣因寺图说》可知,圣因寺景观的左边是以“万岁楼”为中心的世俗权力世界,而右边则是以“圣因寺”为中心的宗教权力世界,个中隐约反映出世俗权力空间和宗教权力空间两分,但二者又合为广义上完整的圣因胜迹。

在世俗权力空间,万岁楼居中而建,南邻西湖,群峰环绕,楼中奉设康熙帝牌位和御容,“万姓衣冠瞻仰楼下,凛然有‘天威咫尺’之义”。自楼而西为步廊,自步廊而南为云岫阁,前眺秦望诸山。阁

①《奏报西湖行宫修理情况》,《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2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6年,第865页。

②《奏报拿获盗窃杭州行宫器物之贼犯徐大、方大来二人》,《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8辑,第196页。

③陈兆肆:《清代“断脚筋刑”考论——兼论清代满汉法律“一体化”的另一途径》,《安徽史学》2019年第1期。

④《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174,雍正五年五月十一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05页。

⑤雍正《西湖志》卷10《寺观一》,第4页。

⑥乾隆《杭州府志》卷首《宸章》,第33页。

⑦按,此以雍正《浙江通志》中《圣因寺图》为底图,复对照雍正《西湖志》中所记载康熙年间西湖行宫文字,进而分辨出康熙两朝不同时间的空间范围。

下为望月台,台下为垂钓矶,矶旁为水亭。自亭而西为双桂轩,内树穹碑,刻有雍正帝御书“泽永湖山”四字。由轩而东为光碧亭,亭后因山累石,石上有御题“淳泉”二字,石壁摩崖刻有御制诗一首:“临池怀雅则,采秀在山青。每念风波息,心宽与水平。”此处“风波”之息,不独是指自然之风波,亦隐指政海之风波。万岁楼东为西湖山房石壁,东有小龙泓。又北为揽胜斋。自此而东为涵清居,后有修竹万竿,中建六角亭。时人谓:“全湖之胜悉揽于圣因寺,而寺中之胜咸萃于万岁楼,洵明圣之福地也。”^①“明圣”二字,一则指“明圣湖”——西湖,一则称颂天子之圣明。由此可见,供奉圣祖御容、牌位以供万民瞻仰之“万岁楼”,无论是从高度还是中轴位置来看,均是圣因寺园林中至为突出、最为中心的建筑。

在宗教权力空间,第一进为弥勒殿,内有李卫题联:“山外皆山,峦岫绕成清净界;画中有画,笙歌谱就太平图。”进内为韦陀殿,藏有康熙帝南巡舟中所临米芾书法一帧。第二进为大雄宝殿,上悬御书“泽永湖山”匾额,内供万寿宝藏,并世尊旃檀像。第三进为法堂,内供钦颁道藏。第四进为观音殿,供大士铜像。第五进为禅堂,由东为关帝殿,为大悲阁,西进为方丈,再进为内方丈,有李卫题联:“圣德遐昌,北极恩光昭北阙;皇仁远被,西湖瑞霭接西天。”^②此中布局有几点可堪深解:首先,李卫作为地方官,在此皇家寺院中两度题联,触犯大忌。显然,以李卫“不甚识字”(袁枚语)的水平视之,此联乃为别人捉刀之作。李卫此举,在其自己,不无附庸风雅、沽名钓誉之想。但在他人看来,实为“恃宠骄纵”之行。有人向雍正帝密告李卫有骄纵甚至僭越之举^③,后来乾隆帝清算李卫时也曾指斥其“仰借皇考恩眷,颇多任性骄纵之处”^④,此点即为重要罪证之一。其次,韦陀殿内藏有康熙帝南巡舟中临米芾的一幅书法,意在彰显康熙帝的书法功底及其倾慕汉家文化之意,正如常建华所言:康熙在南巡过程中的系列书法活动,“向世人展示了满族皇帝深厚的儒学修养与文人形象,表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认同,表达了对于明朝治统的接续……康熙帝的南巡,尤其是南巡中进行的书法活动,不仅是文化行为,也具有政治意义。”^⑤此亦可视作世俗权力符号嵌入宗教空间之一表征。最后,圣因寺内还供奉着北宋时期所刊布的万寿道藏以及康熙帝的钦颁道藏,彰显出彼时“释道并尊”的理念。

总之,雍正时期置建的圣因寺园林,在维持康熙年间西湖行宫格局基础上,不断拓展西北部空间,接续造景,并向士民开放,最终形成三重空间:中路为佛殿,供游人们参禅拜佛;东路与西路为景观区,供游人们参观流连,时人赞曰:“山环水复水环山,月地云居山水间”;^⑥后部则是“万岁楼”,供奉着圣祖御容和牌位,供士民瞻仰。在此,自然风光、世俗帝王文化、佛道宗教文化并融一体,吸引着观光者与朝圣者在“游目骋怀”之余,既感受到昔日皇家禁苑的威严,又体会到佛教寺庙的神圣。雍正《浙江通志》中称圣因寺园林为“天上之琳宫,人寰之福地”,此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表达有异曲同工之处,正可见其风景之不俗和地位之神圣。

二、从“天威咫尺”到“泽永湖山”:园林观瞻背后的政治教化

雍正帝继位后,虑及朝政局势、财政压力以及万端待理等各种因素,并无南巡计划,西湖行宫自然被搁置。遗憾的是,对待先父西湖行宫之善后事宜,雍正帝虽曾内心“再四筹度”,但始终三缄其口。不过,我们仍可透过相关奏牍及此后的园林设计,合理分析其内在的意图,尤其是政治性用意。

西湖行宫之所以改置为圣因寺园林,似出于撙节成本的考量,即所谓的“体圣心而惜物力”。如前所述,康熙晚年至雍正朝初期,行宫虽闲搁已久,但作为天子居所,仍需力加维护,时作修缮。时任

①雍正《西湖志》卷3《名胜一》,第5—7页。

②雍正《西湖志》卷10《寺观一》,第4—5页;乾隆《西湖志纂》卷3《孤山胜迹》,第3—4页。

③梁章钜:《樞垣丛话》卷6《胜迹上》,清道光二十年桂林署斋刻本,第8页;《奏陈直督李卫谕帖臣标中军事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7辑,第304页。

④《清高宗实录》卷1102,乾隆四十五年三月上,《清实录》第22册,第755页。

⑤参见常建华:《康熙南巡中的书法活动》,《学术界》2019年第10期。

⑥高晋等编纂:《南巡盛典》卷9《天章》,清乾隆三十六年武英殿刻本,第5b页。

山阴县知县张我观在《覆瓮集》“提解耗羨事”中记载,“修理西湖行宫”乃“目下最紧要者”之一。^①由此可见,对西湖行宫的维护之费确属当年一笔重要的地方财政支出。行宫之维护,动用公帑,实则与康熙帝当年依靠捐资修葺而禁用钱粮正项的初衷有违。可是不动用公帑,则又面临着修缮经费无着、管理人手缺乏等现实困境。在此背景下,功利精神深入骨髓的雍正帝和李卫君臣二人首先算了一笔经济账。雍正五年,李卫上书雍正帝,请求将西湖行宫改建为佛寺,以便后续管理,其言:“西湖行宫曾经圣祖临幸,今则闲设湖滨,无以展诚敬之思;而修理需费,防护需人,一有疏虞,臣子私衷何以得安?伏思行宫为殿廷宫室,非敢作地方别项公所,仰惟皇上广孝之心,俯就臣民报恩之念,恳请钦定嘉名,御书匾额,延请高僧焚修颂祝,量拨‘西湖岁修公田’以资养膳,其中所贮物件,择民间不敢用者解送内库,其余留为供佛之需。”^②李卫确知雍正帝不会南巡至杭,无需用此行宫,故其提出如下改置理由:首先,先帝行宫闲置,有所浪费,欲有所用,最好能借此展示对先帝的“诚敬之思”。这一设想为后来在万岁楼上安奉御容埋下伏笔。其次,目前该地为行宫,规格高,所以防护、修缮成本不菲,尤其是政治和法律风险太高。上述“一有疏虞”“择民间不敢用者解送内库”云云,显然是有鉴于先前盗贼肆窃行宫而带来的沉重压力。最后,行宫原系帝王居所,自不便改成一般官所,易为另一重神圣空间——佛寺,似最为妥当。改成佛寺,除了营造神圣庄严的氛围外,还可延请高僧“焚修颂祝”,以为帝王和王朝累积善业,可谓一举两得。

同年,雍正帝针对李卫奏请作出以下批复:“圣祖皇帝念切民生,省方问俗,不费地方一丝一粟。每次颁发谕旨甚明,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至于驻蹕之所,地方预备行宫,乃出于臣民爱戴之心,不能禁止,亦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今行宫既属闲设,每年修葺需费,防护需人,在本地有司未免又多一番经理,非所以体圣心而惜物力也。李卫所奏甚是,即照所请行。”^③从上述批复来看,李卫抱怨行宫防护、修缮成本高昂,令雍正帝略感不快,故其郑重指出:其父亲之本心(所谓的“圣心”)并不想在南巡中兴作行宫,驻蹕于既有公所即可,实无需花费地方“一丝一粟”,无如地方出于爱戴之心,非得另造行宫,那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在雍正帝看来,出于节用爱民而准李卫所奏,实际是回归到康熙先帝及自己的本意,即所谓“体圣心而惜物力”,洵非李卫之创意。

李卫的奏请突出“修缮、管理成本”,而雍正帝的朱批亦有“体圣心而惜物力”等说辞,凡此似表明“撙节成本”乃系“宫改寺”的根本缘由。不过,此间有不能自洽者。首先,雍正五年将行宫改造成圣因寺后,并未表现出“爱惜物力”的一面,相反在原行宫西北部大肆增建景点,耗资甚巨。其次,圣因寺保有庞大的僧侣队伍,常年维持之费远超此前闲置行宫的开销。李卫最终决定动用“西湖岁修公田”,以解僧侣斋米之急。先前,李卫曾利用疏浚西湖时所剩捐银,买入一千一百亩海宁盐田地,以每年所收花息作为疏浚西湖之资,此“西湖岁修公田”之由来。李卫将其中一百亩拨与圣因寺,以田地收益维系寺内斋米支出。^④此外,还令僧侣们在“六桥堤上俾艺果蔬以充食用”。雍正十一年后,雍正帝“钦命悟修禅师明慧来主方丈”,寺内“焚修徒侣、云水高僧至者日众”。^⑤面对僧侣日众,既定经费捉襟见肘。雍正十一年,浙江总督程元章曾奏请朝廷准许司库拨款,以供圣因寺香火灯养膳之资。雍正帝断然拒绝,其理由是:“司库钱粮,均关正帑,拨为寺僧养膳,办理未协。”后副都统隆昇利用此前经管北新关时所收存的盈余税银,置买官田数百亩,拨入寺中,方才弥补了此项费用短缺。^⑥以上可见,自圣因寺成立后,如何解决与日增多的僧侣养膳之资,一直是棘手之事。总之,君臣大费周章,易宫为寺,扩建园林,所费不貲;加上僧侣日众,米食一项亦耗资颇巨。这些足以说明雍正帝“体圣心而惜物力”之言仅为表面说辞,实则背后藏有更深层次的政治考量。

康熙一朝,随着全国形势底定以及清廷对士人的笼络,江浙地区与清廷之间的矛盾渐趋缓和。然而,雍正三年、四年,接续发生了几起“忤逆”大案,因大多涉及浙籍士宦,故雍正帝对浙江士子的敌视

①张我观:《覆瓮集》卷6《赃私》,清雍正四年刻本,第10页。

②③⑤雍正:《西湖志》卷10《寺观一》,第3、3—4、6页。

④参见雍正:《浙江通志》卷52《水利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20册,第36—37页。

⑥《奏为修理天台国清寺工程事》,《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2辑,第440页。

剧增。^①其结果是,清廷于雍正四年停罢浙江士子的科举考试^②,足见两者关系已至剑拔弩张之境地。当此之时,作为忠于雍正帝的心腹臣子——李卫,欲对相关涉事者严加惩处,以与皇帝保持同步。但李卫作为浙江大员,与浙江士子亦有“休戚与共”之连带关系,故又须设法缓和雍正帝对浙江的敌视和打压,借以在当地建立威望,尤其是获得广大士子的拥戴和支持。当此困局和危机之下,他“一方面上书朝廷‘将逆恶查嗣庭早置重典,明正国法’,以安定浙江人心;另一方面,向雍正汇报各种所谓的‘瑞兆’,以此来说明浙江士习日渐端正,希望雍正能准浙江士人应考”。^③李卫此时奏请将西湖行宫改为佛寺,以此来“俯顺浙民慕思无已之诚”,并于“其地虔供法王,朝夕焚香祝颂,书‘圣因寺’额于寺中,建万岁楼崇奉圣祖神御龙牌,俾万世臣民恭敬瞻仰”^④,也是乘机取悦帝王,期望雍正帝与浙江士子间的紧张关系得以缓和,并重新建立对浙地的信任和好感。^⑤雍正帝也意识到长久敌视浙省文化精英不明智也不现实,故循梯而下,即允所请。雍正六年谕令:“明年即一届乡试之期,浙省士子准其照旧乡、会试。”^⑥由此,浙江为期三年的科举禁令终被解除。雍正帝对浙江士子从愤恨、打压到宽恕以待的转变,其中李卫借改置行宫之机力作调和,可谓功莫大焉,诚如汪利平所言:“利用康熙的遗迹和雍正的影响,将其建成浙江与清代君主之间一个实实在在的联系。”^⑦

对于并不卑服的浙江士子,雍正四年先以停罢其科考而示之以“威”;三年过后,又以恢复其科考而怀之以“德”。雍正继位以后,未再举行南巡,如何在自己“缺席现场”的情势下,继续对浙江士民实施“恩威并施”的教化,是一直萦绕于怀的问题。而圣因寺园林这一“揽西湖全胜”的重要空间,无疑为其推展政治教化提供了一方平台。

改建后的圣因寺,实际上成为御容瞻仰和参禅礼佛合二为一的场域,尤其是万岁楼上安奉圣祖御容像,为臣民瞻仰。御容安奉是当朝对先朝帝后画像予以供奉、祭祀或瞻仰的一项礼制。这一制度滥觞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初安奉神御,或于宫中别殿,或于寺坛庙观,并无定所。降至清代,相关制度逐渐完备,所谓“国家缘情立制,宜极明备周详,敬念列祖创垂,显承斯在,永怀先泽,瞻仰长新,式衷庙裕之仪,期协家庭之制”。^⑧清代规定寿皇殿是供奉御容之专所,而恩佑寺、永佑寺、安佑宫、凤凰楼等,亦以安奉御容为其主体功能。不过,与上述供奉御容的空间相比,杭州圣因寺的特点至为鲜明。首先,自雍正朝以迄清末,圣因寺作为供奉清代帝王御容的重要场所,相沿不替,几未中断,非其他御容供奉之地可比。其次,圣因寺万岁楼的御容瞻仰随时开放,“俾万世臣民敬谨瞻礼”^⑨,凸显出来的是一种“开放的纪念性”。^⑩而其他皇家御容供奉地,则是择时供皇室或有相当地位的官员瞻仰。^⑪《西湖志》中有一段明确记载:“会城文武僚属遇岁朝、长至或初履任,及他省仕宦道经武林,必相率诣圣因寺,瞻仰圣祖神御、龙牌;通省士民熟闻习见,于以发其尊君亲上之心。”^⑫由此可见,御容瞻仰的群体较为广泛,除了后来南巡帝王及其随侍人员外,既包括该省文武僚属以及途经杭州的他省官宦,

①参见冯尔康:《雍正传》,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9页;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卷18,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页。

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起居注册》,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乙卯,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66—867页;夏卫东:《雍正四年停浙江乡会试始末》,《历史档案》2003年第1期。

③夏卫东:《雍正四年停浙江乡会试始末》,《历史档案》2003年第1期。

④雍正《浙江通志》卷1《图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19册,第95页。

⑤⑪参见徐瑾:《清代皇帝御容安奉制度探析》,《故宫学刊》2015年第2期。

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起居注册》,雍正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丁未,第2226页。

⑦汪利平:《杭州景观建设与清代政治文化》,夏明方主编:《历史的生态学解释:世界与中国》(《新史学》第六卷),第179页。

⑧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891《内务府》,台北文海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⑨乾隆《西湖志纂》卷3《孤山胜迹》,第4页。

⑩“开放的纪念性”一词借用于李恭忠的相关研究,参见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206页。

⑫雍正《西湖志·李序》,第3页。

更包括浙江全省士民。在瞻仰时间规定上,省城文武僚属一般固定在新年之始和夏至两个节点,而省城初履任官员、别省途经杭州官员及全省士民,则未限定具体时间,原则上随时皆可。雍正七年,李卫率参佐僚史乘船至圣因寺,拜谒圣祖神御、龙牌,并一睹当年帝王南巡时的睿藻留题。^① 雍正十年,因署理总督李灿与王国栋对圣祖神御及龙牌行礼失仪,雍正帝大为不满,要求对其“严加申饬”^②,可见相关礼制森严。

关于万岁楼上的康熙帝御容像,郭嵩焘在《玉池老人自叙》中有一段非常珍贵的记述:“自是三梦圣祖,或召对,或扈从在途,梦中惟沉吟咏叹圣量之宏。其后,入直南斋,举以语治贝勒,治贝勒因问所梦圣祖作何形状,答言:‘西湖见圣祖御容阔大,与梦中全别:长面瘦削,白须长六七寸。’治贝勒击节曰:‘君所见,真圣祖也。往年见圣祖御容,良如君所谓阔大者,后奉旨承修奉天太庙工程,请见圣祖御容,瘦削多须,正如君所梦,盖晚年御容如此。’”^③治贝勒,即乾隆帝第十一子成亲王爱新觉罗·永瑆的曾孙载治。从这段史料可见,郭嵩焘曾在西湖见过康熙帝御容画像,尤觉面容特别宽大,与梦中所见晚年面庞瘦削者有很大不同。结合前人关于康熙帝肖像画的研究^④,圣因寺中所供奉者乃中年时期的《康熙帝朝服像》。^⑤ 英国图像史家彼得·伯克曾说:“写实主义的诱惑,严格地说,就是把图像等同于事实,在照片和肖像上表现得尤为强烈。”^⑥观中年时期的《康熙帝朝服像》,康熙帝正襟危坐于宝座之上,面容威严而庄重,眼神深邃而坚定。此幅御容像高 2.77 米,宽 1.95 米^⑦,悬挂在圣因寺最高建筑万岁楼中,以供万民瞻仰,正如雍正朝《西湖志》中所言:“万姓衣冠瞻仰楼下,凛然有‘天威咫尺’之义。”^⑧

何为“天威咫尺”?当年周天子赏赐齐桓公小白,并念其年勋俱高而令免拜,但小白以“天威咫尺”而“不敢不拜”。^⑨“不敢不拜”所彰显出的正是“煌煌天威”。清帝曾言:“欲王者,上奉天时,必以得天为正。”^⑩世俗之王要奉天而行,王权来源于且受制于天命、天道。天,无疑关涉权力来源的合法性、神圣性问题。从前揭圣因寺中儒、佛、道“合一并重”的布置即可看出,雍正帝调用了儒、佛、道中相关思想资源,增加自己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威,毫无疑问是指皇权的无上权威。处于最高位置的万岁楼,安奉着为人瞻仰的康熙帝御容,官民匍匐在下,感受皇权的至尊威严,如同齐桓公面对周天子一样“不敢不拜”;同时面对至尊威严,浙江士民也不免唤回对此前几年浙江诸案的一丝苦涩记忆,尤其是因“杭州举人汪景祺忤逆案”“海宁查嗣庭案”,致使雍正帝断然停罢了浙江士子的科考,其惩罚不可谓不大。诚如有学者所言:“御容肖像在实际生活中是被‘拟人化’了的,见像如见人。”^⑪皇帝肉身的物化象征——御容,悬挂在高处,以一种“君临天下”“如朕亲临”的威慑力和视觉冲击,彰显着帝王的威仪,宣示着清王朝对当前这片区域的统治权。“天威”二字凸显君权高高在上而遥不可及,彰显“君父”与“臣子”之间不可逾越的距离。但“咫尺”二字,又反映出“君父”与“臣子”在情感上的亲近性,更强调血缘拟态上父与子的关系。上述两者共同体现出君父“威、德”的双面性。“亲民”是《大学》等儒家经典中所宣示的重要政治伦理,强调“君父”要与“子民”拉近距离以悉民情民隐,这也正是帝王举行南巡盛典时经常诉诸的道德性理由。“咫尺”不仅是情感上的距离,还体现在空间、时间两重维度。尤其是,如今康熙先帝业已逝去,而当朝帝王也不再南巡,无论是在空间上的亲近,还是在时间上的追远,皆需通过一种象征性的仪式,拉近帝王与官民的距离。在此背景下,“万岁楼上恭设圣

①雍正《西湖志·序》,第 2 页。

②参见《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 93,雍正十年二月初一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19 册,第 649 页。

③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清光绪十九年养知书屋刻本,第 38 页。

④⑦汪元:《康熙皇帝肖像画及相关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 年第 1 期。

⑤故宫博物院编:《清史图典:清朝通史图录·康熙朝》上册,紫禁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09 页。

⑥[英]彼得·伯克著、杨豫译:《图像证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1 页。

⑧雍正《西湖志》卷 3《名胜一》,第 6 页。

⑨《春秋左传集解》上册,凤凰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41 页。

⑩刘逢禄:《四书是训》卷 9《问陈》,清光绪贵池刘氏刊聚学轩丛书本,第 3 页。

⑪黄博:《如朕亲临:帝王肖像崇拜与宋代政治生活》,山西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34 页。

祖仁皇帝神御”，如朕亲临，就显得更为必要。此外，这种近在“咫尺”的意义是指向君民之间的。无论现场一睹真容，还是通过图像瞻仰御容，“得见天颜”对君主而言，固是亲民仁爱的表现；而对民众来说，也是一种瞻云就日的无上光荣。正因如此，乾隆帝在南巡时，一再要求属下不要实行严格的清场回避制度，“让百姓看到我，让我看到百姓”都很重要，正所谓“不得概行禁止，以阻黎庶瞻就之诚”，“既足慰望幸之忱，而朕亦得因以见闾阎风俗之盛”。^①

清朝统治者强调御容瞻仰的意义时，往往会相对淡化其思想领域的灌输渗透用意，而特别强调俯顺民众之渴慕爱戴之诚，似乎一切从民众的利益和视角出发，如乾隆帝就曾在《诣圣因寺瞻礼》诗中提到：“南巡昔岁驻西湖，神御爱留敬谒趋。诩是圣情在游揽，都缘民莫切吁谟。”^②但无论如何，圣因寺中御容瞻仰的根本目的，可用《西湖志》中一言以蔽之：“通省士民熟闻习见，于以发其尊君亲上之心，是又教化之所。”^③故“尊君亲上”是圣因寺御容瞻仰的最终教化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圣因寺东路大雄宝殿的匾额上有“泽永湖山”四字御书，而西路双桂轩特建御碑亭，碑上同样摹刻有“泽永湖山”四字。对“泽永湖山”四字题刻的至再重视，无疑是提醒游观士民：正是先帝南巡时的赞誉和恩泽，才使这片湖山从妖媚冶艳的恶名中解放出来；正是本朝的大力治理，才使得这片西湖在历经元明低谷后重放光彩；正是本朝的皇恩浩荡，才使得浙江士子重获科考权益。这四字彰显出政治权力对西湖这片景观的重新形塑，也凸显出朝廷对浙江地区的仁政恩泽。如果将“湖山”再进一步解读为“江山”，那就更意蕴深长。这四字意在提醒游观士民，康熙一朝对浙江地区所采取的田赋蠲免、刑罚恩赦以及科考恩科等种种仁政。在某种程度上，康熙帝与朝廷是二合一的存在，康熙帝的恩泽即朝廷的恩泽。

综上，雍正五年后，圣因寺园林的建造成为雍正帝和浙江士民关系缓和的契机，雍正君臣借此将“恩威并施”的教化意图嵌入万岁楼“天威咫尺”的御容瞻仰以及园林多处“泽永湖山”的御碑观瞻之上。尤有进者，圣因寺园林位于观赏西湖全貌的最佳地点，“在锦带桥西，孤山之南，面明圣湖，群山环拱，万堞东连，揽全湖之胜”^④，平素游人如织，人头攒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扩大政治教化的辐射范围，放大教化效果。

三、从“临御兴居”到“开演正觉”：“宫改寺”与整顿禅林的意图

雍正朝虽将西湖行宫改为佛寺，但圣因寺中的宗教文化元素，如上所揭，颇形复杂多元，释道两类元素兼有，这与雍正帝“性命无二途，仙佛无二道”的认识是颇相契合的。不过，圣因寺仍以佛教元素为主体。由行宫而改为寺庙，固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和本朝家法作依据，但清朝在京城之外将行宫改为寺者仅圣因寺一例，这又与雍正帝对浙江地区佛教的无序发展深感不满，进而欲借圣因寺而行整顿之政攸然相关。

在清以前的中国历史中，将先帝驻蹕的行宫或曾居住过的府邸改造为佛寺的做法，偶有见及。^⑤降至清朝，似成定则，如时人自言：“我朝家法，凡先皇帝临御兴居之所，昭事清严，多尊为佛地。”^⑥典型如雍正三年胤禛将自己当年藩邸改为行宫，并赐名“雍和宫”；^⑦乾隆帝即位后，着手改宫为庙，历经四十余年，使其最终成为皇家藏传佛教寺院。^⑧又据乾隆所撰《雍和宫碑文》记载：“皇祖（康熙帝）凡

①高晋等编纂：《南巡盛典》卷1《恩纶》，第21a页。

②乾隆《杭州府志》卷首《宸章》，第11页。

③雍正《西湖志·李序》，第3页。

④雍正《西湖志》卷10《寺观一》，第1页。

⑤喻梦哲：《明代关中木构遗珠——泾阳太壺寺大雄殿》，《文物建筑》第9辑，2017年；雍正《陕西通志》卷29《祠祀二》，清雍正十三年本，第83页；傅梅：《嵩书》卷13《同太平公主游九龙潭》，明万历刻本，第28页。

⑥庆桂：《国朝宫史续编》卷61《宫殿》，清嘉庆十一年内府抄本，第5页。

⑦《清世宗实录》卷33，雍正三年六月丁卯，《清实录》7册，第15页。

⑧张铭娟：《乾隆朝雍和宫改庙修缮研究》，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

临御燕处之适且久者,多尊为佛地。曰福佑寺,则冲龄育德之所也;曰恩佑寺,则鼎成陟方之次也。”^①“宫改寺”的做法,一方面避免了闲置房屋所造成的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也借以表达崇佛敬祖的信仰和理念。不过,在京城之外“宫改寺”者,却仅有杭州圣因寺一例。揆诸史料,雍正帝似对杭州改置圣因寺一事,给予非同寻常的重视。雍正即位后,“十年不见一僧,未尝涉及禅之一字”^②,唯恐被扣上“佞佛崇道”的帽子,招致汉人士大夫的批评。其于建寺起塔、修缮古刹名寺等,皆待皇位既固方才进行。^③雍正元年,浙江巡抚李馥曾上书请求修缮杭州湖山一带寺院,雍正帝十分谨慎,谓之“不可太过,亦不可令知”。^④雍正五年,各地“宫改寺”的奏请络绎不绝,皆被雍正帝拒绝,唯独“特允督臣李卫之请改为佛寺”。^⑤从结果上来看,康熙帝南巡途中有数十座行宫^⑥,而在停罢南巡的雍正一朝,最终也仅有杭州西湖行宫改置为佛寺。比如,据同时期苏州官员奏报,苏州行宫位于苏州织造署衙内,一旦改寺,官僧杂处,闲杂人等自由出入,难成体统,故最终只能定期派衙内老成人朔望之时焚香祭拜,平时则紧闭大门。^⑦西湖行宫相较于苏州行宫,具备地理上的独立性,因而也便于整体改造成佛寺。又如,迟至雍正十一年,江西巡抚谢旻奏请拨款修缮庐山瞻云寺,雍正帝竟全然不顾其中还存有先帝行宫及圣祖龙牌,以“此举甚属多余”“岂可如此滥用”“使不得”等语立斥其非,拒其所请。^⑧在上述背景下来看,雍正帝鼎力支持李卫改建西湖行宫为佛寺,为非分之恩、逾格之举。杭州圣因寺被特殊对待,绝非仅是地方官员表面所言之“其地虔供法王,朝夕焚香祝颂”^⑨那般简单,除浙江在经济、文化上占有特殊地位外,更多是与雍正帝对浙地佛教深感不满进而欲借圣因寺而行整顿之政密切相关。

雍正《浙江通志》的编修者言及圣因寺建立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其地虔供法王,朝夕焚香祝颂。”^⑩言外之意,圣因寺之建,目的之一在供奉“转轮法王”,通过朝夕焚香,为之祝颂祈祷。此“法王”即指已宾天之康熙帝。既往研究指出,清朝的帝王与佛教渊源甚深,普遍都拥有“转轮法王”与“文殊菩萨化身”的称号。^⑪学者认为,这些称呼对于清帝的核心意义在于,确认其作为中原王朝统治者的身份,强化满洲和清帝的神圣性。易言之,佛教对于清帝来说,已不仅是受到满人传统信仰——萨满教的影响,更是成为他们应对现实政治的必要条件,“它同儒家文化一样,成为清代中国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⑫因此,这种“以佛护国”的统治策略,使得清朝皇帝们经常利用敕建佛寺的方式,施行他们的政治理念。这些寺庙成为一种特殊的宗教政治景观与场域,一方面实现了皇权对于宗教领域的干涉和整顿;另一方面,则又利用宗教进一步巩固了皇权。这种利用佛教的统治策略,自然包括将先帝临御兴居之所改建为佛教寺庙。

雍正在其藩邸时期,由于居所靠近柏林寺^⑬,便常与禅僧往来,共同讨论性宗之学。他喜读内典,

①董诰等辑:《皇清文颖续编》卷首9《碑文》,清嘉庆武英殿刻本,第2页。

②杨奇霖:《迦陵性音考——兼论雍正帝与藩邸汉僧之关系》,《宗教学研究》2017年第3期;冯尔康:《雍正传》,第455页。

③雍正十年之后开始大量修缮古刹名寺,包括浙江荆溪崇恩寺,绍兴报恩寺,舟山普济寺、法雨寺等,参见《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17《崇恩寺碑文》《报恩寺碑文》《普陀山普济寺碑文》《普陀山法雨寺碑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0册。

④《奏谢恩赐内府磁器并修缮杭州湖山一带寺院》,《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辑,第585页。

⑤雍正《西湖志·张序》,第1页。

⑥孔俊婷、王其亨:《法天则地揭意象——清代行宫园林选址考析》,《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

⑦《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250,雍正五年十一月初七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4册,第504—505页。

⑧《奏为动用耗美银两修理瞻云寺行宫事》,《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1辑,第258页。

⑨⑩雍正《浙江通志》卷1《图说》,第95页。

⑪参见安海燕:《作为“转轮王”和“文殊菩萨”的清帝——兼论乾隆帝与藏传佛教的关系》,《清史研究》2020年第2期。

⑫祁美琴、安子昂:《试论藏传佛教的王朝化与国家认同——以清朝敕建藏传佛寺为中心的考察》,《清史研究》2019年第1期。

⑬王松、宣立品:《雍正皇帝与迦陵禅师——从迦陵禅师和大觉寺看雍正皇帝与佛教》,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尤其是对禅宗,不无慧解。他曾得遇独超方禅师,师从章嘉国师,并结交迦陵性音禅师,与他们相互切磋。^① 他亦曾升堂说法,开导群迷,并以帝王之尊,亲自编选《御选语录》,刊布天下。^② 有研究者指出,以往史家大多认为雍正帝只是将佛教作为一种统治工具,并非内心崇敬佛理,从而忽视了他自身深厚的佛学造诣和内心皈依。^③ 不过,纵观雍正朝的历史,佛教对于雍正帝来说,无疑更多的还是一种统治策略与政治手段。^④ 如其自己所言:佛教之设,“不过导人为善……其论虽无益于吏治,其理亦无害于民生,至于勉善警恶,亦有补于世教”。^⑤

雍正即位以来,便开始依照自身的佛教观,对佛教世界加以整肃和布局,尤其是针对江浙地区佛教之无序、堕落,深感不满,并急欲对之改造。他曾严词批评江浙等地邪教流布,称其:“大抵妄立名号,诳诱愚民,或巧作幻端,或不事耕织,夜聚晓散,党类繁多,此等之人踪迹多属诡秘,而奸回则更不可测。苟不绝其根株,必致蔓延日甚。地方诸大僚,倘务姑息,不为访拿,是养奸也。”^⑥ 另外,他还对江浙僧人交接士大夫而常涉世俗的行为同样表示不满,“今其魔子魔孙,至于不坐香,不结制,甚至于饮酒食肉,毁戒破律,唯以吟诗作文,媚悦士大夫,同于倡优伎俩,岂不污浊祖庭?”^⑦ 他在对浙江巡抚李馥的朱批中,直指浙江“僧海”污浊:“浙江俗称‘僧海’,乃纳子容身之要地,近十年来释子原无可取者,闻之普概丛林,狼狽不堪,朕甚悯之。尔可仰体朕一夫不得其所、若已推而纳之沟中之念,务必暗暗留心抚恤。此谕不可再令一人知之!”^⑧ 实际上,“浙江古刹、丛林最多,而杭郡尤甚”^⑨,雍正对浙江尤其是杭州佛教的腐朽、堕落表示担忧,并希望有人能够护持佛教,导之于正道。然而,饶有兴味的是,雍正并不愿自己对浙江佛教的态度为僧俗两界更多的人所知,故对浙江巡抚要求:“此谕不可再令一人知之”。这深为契合雍正即位后十年间不言佛事的承诺。因此,雍正帝在整顿浙江禅林时,并不愿采取公然下达谕令而大张旗鼓的方式,但立志于整顿当地禅林的态度已甚明显。

雍正十年之后开始对浙江禅林大力整顿,其中最重要的举措之一,便是钦派自己门徒去业已声望渐隆的圣因寺担任主持。雍正十一年,宫中举行法会,雍正亲自开堂授徒,共收门徒十四人。其门徒之一——悟修禅师明慧^⑩,于该年被派往杭州,“循命住持圣因寺”^⑪,主持浙江丛林事务。但其后因“干预公事”^⑫“为人说情”^⑬,被召回京城,并勒令其“锢不许复出”。^⑭ 雍正帝对明慧及时惩戒的态度,也从侧面说明他竭力维护圣因寺在禅林中的重要地位。雍正十三年又命无阇永觉禅师超盛^⑮南下,代替明慧,前往杭州圣因寺担任住持。此后,超盛对圣因寺僧众种种积弊力加整顿。^⑯ 例如,超盛针对寺内“是非繁杂”“无丛林气象”等风气,“逐项逐条分析利弊,大小事务悉与隆昇商酌,因革相宜,然后举行,而地方官僚俱极护持。此番清理,仰蒙皇上万年之福,圣因常住,自获万年清静”。另外,

①③释圣空:《清世宗与佛教》第3章《雍正与佛教的关系》,中华佛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00年。

②刘雨虹:《雍正与禅宗》,(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1997年版,第1页。

④冯尔康:《雍正传》,第455页;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页。

⑤⑧《奏报台匪越狱者已擒回臬示》,《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辑,第349页。

⑥《谕江苏巡抚严飭所属查禁邪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页。

⑦爱新觉罗·胤禛:《御制拣魔辨异录》附1《上谕》,清雍正十一年刊行本。

⑨《奏报崇明南汇等盐场金秋被海潮及僧人必待以礼不令僧众失所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7辑,第298页。

⑩《谕内阁著将玉琳琇法系僧明慧赐紫封为悟修禅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2册,第190页。

⑪《奏报前来杭州并住持斋僧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2辑,第236页。

⑫《奏报悟修禅师明慧滥用禅师印信嘱托公事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3辑,第125页。

⑬《奏报悟修禅师明慧为人说情被扬州府通票督抚等事》,《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3辑,第27页。

⑭全祖望:《鮑琦亭集内编》卷19《前甘泉令明水龚君墓志铭》,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47页。

⑮参见汤大奎:《爰砚琐谈》卷上,清光绪刻常州先哲遗书本,第20页。

⑯杨奇霖:《雍正皇帝与如川禅师——兼论18世纪汉传佛教僧俗交涉的社会图景》,《佛学研究》2019年第1期。

又因明永“为人老诚,可充主席”,超盛遂于五月十二日将其“送方丈”,接替自己住持圣因寺,干预寺庙的人事安排。^①与此同时,透过他们与雍正帝的往来文书以及其他地方官员的奏报可以发现,无论是明慧还是超盛,在担任住持期间,不断地“以一名出家人的身份”^②,及时向雍正帝报告江浙各寺院情况,为帝王直接或间接干预佛教事务提供参考。

超盛等借助皇家僧侣与帝王门徒的身份,与政界之人交往密切,且颇受各方官宦之逢迎。一方面,超盛为直隶总督李卫、苏州织造海保、管理江海关商税之年希尧等指点开示,提供法施。^③一方面,当地士宦向超盛提供“财施”,贡献斋衬银、器具。^④此外,部分地方官员还会延请超盛“上堂打斋”。^⑤圣因寺住持甚至能越过几省督抚,与江浙各织造自行商酌相关事宜,一时权力炙手可热。从某种意义上说,杭州圣因寺,除去其本有的宗教功能外,还发挥着与内务府所辖各织造署类似的情报侦察功能。

雍正帝意欲凭借帝王和法王的双重身份,使其统治成为政权与神权的高度结合物,以此强化对王朝的统治。职是之故,李卫奏请将西湖行宫改置为佛寺,正好迎合了雍正帝的心意。通过皇权干预,能够利用佛教整顿江浙禅林,并派遣称心的寺庙管理者进行监督与教化,从而达到“以佛护国”的目的。同时,利用寺庙这一特殊的宗教政治景观与场域,尤其是钦定住持与地方士民的交游,使雍正帝能了解地方情事,更好笼络、监控江浙士民,以此稳固对这块区域的统治。改建之后的圣因寺,挟皇家之威名,香火旺盛,善男信女络绎不绝,很快便与净慈寺、云林寺(今灵隐寺)及昭庆寺,并称为杭州“四大丛林”^⑥,一时声名大噪。

余 论

既往学者论西湖及其诸景,极言其经济、娱乐、文化功用,而于政治一端,则殊少措意。《风景与认同》一书提及:“风景的再现并非与政治没有关联,而是深度植于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之中。”^⑦米切尔认为:“风景不仅仅表示或者象征权力关系,它是文化权力的工具,也许甚至是权力的手段。”^⑧李恭忠也在其相关研究中指出:“一座建筑,往往通过有形的形态、构造和装饰,来表达建造者的主观意念。”^⑨在雍正帝与浙江总督李卫的合力下,康熙帝的西湖行宫被改建成具有相当规模的圣因寺园林,景观化和宗教化的双重特征十分鲜明。这一改建行为的背后,体现出极强的政治规训和教化意图,抛开表面上的“体圣心而惜物力”和“虔供法王,朝夕焚香祝颂”等说辞不谈,具体表现在:首先,以“俯顺浙民慕思无已之诚”为名义而建,使雍正帝龙心大悦,亦可借此缓和雍正帝与浙江士民剑拔弩张的关系。其次,在万岁楼上恭设康熙御容以供万民瞻仰,在园林中到处嵌入御制碑题以供百姓观摩,让百姓感受“咫尺天威”,让浙民领受“泽永湖山”,从而完成天命、亲民、仁泽等诸多意识形态的教化和渗透,进而成为“恩威并施”统治策略的具体展示。最后,雍正帝希望借助改造后的圣因寺,整顿杭州乃至浙江禅林,同时获取地方情报。值得注意的是,圣因寺的建置总体上是雍正帝和李卫君臣一心的产

①《恭报南行经过并宣扬佛事情形由》,《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4辑,第751页。

②王松、宣立品:《雍正皇帝与迎陵禅师——从迎陵禅师和大觉寺看雍正皇帝与佛教》,第54页。

③《恭谢恩赐克食》,《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4辑,第233页;《奏谢恩赏荔枝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5辑,第189页;《奏报出京至扬州高旻寺入院内之沿途情形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4辑,第233页。

④《奏报出京至扬州高旻寺入院内之沿途情形折》《恭报南行经过并宣扬佛事情形由》,《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4辑,第233、751页。

⑤《奏报出京至扬州高旻寺入院内之沿途情形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4辑,第233页;《恭报南行经过并宣扬佛事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7辑,第226页。

⑥民国《西湖新志》卷14《志余》,民国十年上海胡氏排印本,第1页。

⑦[美]温迪·J.达比著,张箭飞、赵红英译:《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

⑧[美]W.J.T.米切尔编著,杨丽、万信琼译:《风景与权力》,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⑨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第164页。

物,但也隐藏着李卫一己之私意。通过将行宫改建为寺庙而降低其政治规格,一定程度上规避管理上的政治风险;通过在圣因寺建筑内外的几度题联,打造其本人雅重文学、追慕文治的良好形象,掩饰其内在文化资本欠缺的深层自卑;通过圣因寺的建造,部分化解雍正帝对浙江士子的心中块垒,进而增重自己在浙江士民心中的分量。

景观政治的实践,涉及设计者和游观者等多重群体,是否能达成政治规训和教化意图,并非设计者一厢情愿所能济事,游观者是否愿意或很好领受教化规训意图,也是重要方面。从我们所搜集并深入解读大量雍乾两朝士民的游观诗文来看,他们往往更为重视圣因寺园林不俗的风光,徜徉其间,流连忘返,从而形诸题咏。当然,偶尔也会有人发一声“向昔銮舆垂圣眷,于今佛子戴天恩”^①,但是这些“戴天恩”的感慨大多出诸随侍官宦之口,不无溜须拍马之嫌。观者在“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地消解了设计者的政治初衷。关于此问题,值得后续进一步探讨。

[本文为杭州师范大学科研创新团队项目(TD2025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兆肆(1982—),男,安徽芜湖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黄思珩(2000—),女,浙江舟山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

责任编辑:郝红暖

A Study on the West Lake Imperial Palace was Relocated to Shengyin Temple during Yongzheng Period in the Qing Dynasty

CHEN Zhaosi HUANG Sihe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Abstract: In the fifth year of Yongzheng, Emperor Yongzheng unexpectedly agreed to the request of Li Wei, the Governor-General of Zhejiang, and transformed the West Lake Palace of Emperor Kangxi into the garden of Shengyin Temple, showing the dual characteristics of “landscape” and “religious”. This measure and decision of Emperor Yongzheng could not be explained by superficial rhetoric such as “honoring the imperial will while conserving public resources”, but in fact, there was a strong political intention behind it. Which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ways: firstly, the project was justified as “complying with the Zhejiang people’s boundless reverence”, serving to ease previously strained relations between the throne and Zhejiang’s literati and commoners. Secondly, through activities such as public viewings of the imperial portrait and the display of inscriptions written by emperors, etc., the state completed the edification and penetration of ideological doctrines such as the destiny view, friendly to the people, the benevolence, that has become a concrete demonstration of the ruling strategy of “benevolence and power”. Finally, the renovated Shengyin Temple was used to rectify the Buddhist order in Zhejiang centered on Hangzhou, and local intelligence was obtained in a timely manner.

Key words: Yongzheng period in the Qing Dynasty; West Lake imperial palace; Shengyin Temple garden; political indoctrination

^①华岳:《离垢集》卷5《游圣因寺》,清道光十五年刻本,第1—2页。